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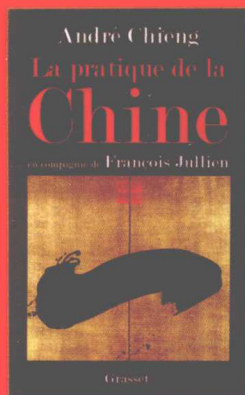
André Chieng La pratique de la Chine

→ 一位法国商人对在华 25 年经历的哲学性思考 ↗

中国人的 经济智慧



[法] 钱法仁 · 著 黄胜强 曹韞陶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André Chieng La pratique de la Chine

→ 一位法国商人对在华 25 年经历的哲学性思考 ↗

中国人的 经济智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经济智慧/(法)钱法仁著;黄胜强,曹韞陶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ISBN 978-7-80745-967-5

I. ①中… II. ①钱… ②黄… ③曹…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7874 号

André Chieng

La pratique de la Chine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2006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1-653

中国人的经济智慧

编 者:[法]钱法仁

责任编辑:徐祝浩

特约编辑:刘 平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7

插 页:2

字 数:157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967-5/F·184

定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中国人是可信赖的吗？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是否有另外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如何与他们建立商务伙伴关系？怎样与他们共同经营企业？

在我组织企业领导人参加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上，此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来。

当今世界，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西方人还仍在两种态度——异国情调的诱惑（智慧的东方）和对于入侵的恐惧（“黄祸”）——之间徘徊着：他们在着迷和妖魔化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至少已经意识到，绝对不能像对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那样来对待居住在这个如此遥远、如此古老而又再次成为如此强大的国度的人民。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是，又该如何做起？换言之，如何“进军”中国呢？

然而，这本书从根本上讲却是一种拒绝，对提供一种密钥的拒绝，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得出的结论，即使我总是遇到这种请求。你在本书中不会找到“钥匙”——那串著名的“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因为我认为，如果想与中国人建立伙伴关系，包括做生意，首先应该重新开启思路：不要试图变成中国人，但要明白，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我们在欧洲通常遇见的截然不同，而且这些程序（无论是行为还是思维）也易于了解，丝毫没有任何失礼、怪异或神秘之处。比如，真理、话语、效率等，在西方是多年不断形成的，从而

已被视为是一种自然而然,达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而中国人却与它们有着不同的关系。因此,如果说文化在这里与经济有关系,这绝不会是在商业的粗糙表面上涂上一层光亮的釉彩,而是因为经济没有文化是不会自己形成的。因此,我们不能把管理与思考割裂开来:我在书中把这两者的结合点称作——中国“做法”。之所以强调“可理解性”这个概念,是因为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甚至会出现一个机遇:不久前还在中国或西方那么盛行的种族中心主义一旦被超越,便可以最终在各种“可理解性”之间流动,从而增进共识——可能这就是一种“智慧”?

它还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并因此理解指引我前行的路线图。

“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便会为之震动……”这句名言的成功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口出此言者——拿破仑,更在于它能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三种情感融合在一起:对她昔日强大的钦佩,对她现在落后的见证以及对她未来威胁的恐惧。自19世纪以来,欧洲(后来是美国)对中国的评价都建立在这三个支点上。我本人也是经过多年才感悟到的。我出生在法国马赛,父母是中国人,我在儿时便从我的法国同学身上感到某种优越感。为了使我摆脱那种低劣的感受,我的父母就用中国的辉煌历史熏陶我。然而,近现代中国的积贫积弱的事实却无法抹去:如果不是这样,我的父母也不可能背井离乡来到法国,他们在这里明白了中国由于缺失了什么才没有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家。他们以为,中国缺少科学技术。所以,我从小就被教育得崇尚科学技术,立志要考取法国综合理工大学——这个颂扬科技的“殿堂”。从那所学校毕业后,我选择了经济专业进行深造,我本可以成为一名在大学从事研究的学者。

1978年，当我结束了学业，和新婚妻子——一位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建筑师，却来到北京组建了家庭，决定在祖辈生长的国度里大展宏图。我们在中国的大学里工作了两年。人生的机缘巧合让我离开了学术生涯，一头扎进商海。我先在一家专门与中国做生意的法国老牌贸易公司担任总经理，后来升任董事长，经商长达25年。我亲眼目睹了中国自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一直到今天所发生的巨变。对于这场影响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被称为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革命，它每天发生的细微变化我都历历在目。

而如今呢？对于中国，我们是应当仰慕她、害怕她，还是包容她呢？在下结论之前，我们首先应当了解她。而这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在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介绍中国的书汗牛充栋，它们或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或是面向少数知识分子的学术论著，现在越来越多地面向不断壮大的想到中国经商办企业的企业家和商人群体。但这些书的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西方人的思维工具来分析中国的现实。这就如同用管道工的工具来做细木工艺。因此，当开始经营我的公司时，我就想获得那个能以西方思维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箱”。

我是从一位哲学家那里获得这个“工具箱”的。《迂回与进入》这本书让我走进了弗朗索瓦·于连的世界，他所出版的著作我全部读过。这位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智者，他的研究让我着迷，他从“外部”来观察西方人，以便更好地理解西方思想。为了找到这个“外部”，他不满足于对印度思想的了解（它是用印欧语系来表达的，因此不足以作为另一种思想），也不满足于对阿拉伯思想的了解（它是欧洲思想的近亲繁殖）。他在寻找一种有系统的、经过精

细加工、通过丰富的文学作品来表达的，并且（至少到 16 世纪为止）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这种探索自然将他的关注落在了中国。不断地往返于不同的思想之间、对比不同的学术思路、分析共同点尤其是各种文化之间某些概念的差异甚至缺失，所有这些具有弗朗索瓦·于连特点的研究，让我找到了苦苦寻求的“工具箱”。我把它用在我的日常工作中，惊奇地发现它们真的很有用！我不断地实践，寻找这种方法能在那些我们通常无法理解的地方给予我们启迪的实例（这个词在这里是商业学校的教学中给出的定义）。有时候，我得出的结论与惯有的结论没什么两样，往往被看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弗朗索瓦·于连的研究方法正是教给你如何质疑那些迷惑大众的“显而易见”，使你不误入歧途而在少有人涉猎的领域中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

本书所叙述的就是我这个受法国教育培养起来，并且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几何学家或经济学家的中国血统的商人在当今中国内部所经历的一切，同时也向读者介绍了一位法国哲学家的著作，这位哲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现在已经成为一名汉学家。

读者朋友们，你们无须通读弗朗索瓦·于连的著作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此书所讲述的一切。我每次引用他提出的观点时，都会引用他的原文并加以评述。也许读者朋友们在书中也找不到什么确切的东西，但与之相反的是，你们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但愿读这本书就像玩中国的“七巧板拼图”游戏一样：将一块正方形切割成七块几何图形——三角形、菱形、正方形。打乱这些图形的顺序，然后再重新组合成最初的正方形，也可以用这七块图形组成各种不同的图形。没有人强行要求玩家只能拼成最原始的正方形，因为无论哪种形状都是真实的。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真理与迂回	1
第二章 创造与改变	31
第三章 矛盾的功效	61
第四章 英雄与战略家	90
第五章 有效性	120
第六章 社会的组织	157
第七章 追赶与全球化	190
跋	弗朗索瓦·于连 206

第一章

真理与迂回

一

“拜托，请少撒些谎。”这是2003年4月10日《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一篇评论中国当局的文章所使用的标题。当时“非典”正肆虐中华大地。文章说：“亚洲已有2400人感染非典，致死96人（一半为中国人），危机处置能力很弱的行政体制使中国未能有效地控制这场流行病。”然而，这个标题是句双关语。实际上，它没有干脆说：“请不要再撒谎了！”而是说：“请少撒些谎！”言下之意是中国无法摒弃“撒谎”的惯例，无奈只能希望少一些谎话。这位记者进一步解释说，对“非典”的处置失误应归咎于行政体制，它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像“非典”这样的危机。

然而，早在1894年，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①就写下下面这段文字：

我们丝毫没有必要去深入了解中国人，就可以得出

^① 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中文文明恩溥，于1872年偕妻子来华，在天津为传教士——译者注。

结论：仅仅听一位天子说话是不可能明白他想说什么的。一个外国人即使成为专家，中文口语精熟，以至能听懂每个句子，在需要时可以用中文写下来，但他却可能无法准确地表明说话者的思想。显然，这是因为说话者并不想说出他真正所想的东西，而只满足于表达某种与他想法类似的东西，为的是让别人以此推断他的想法，或他的部分想法。^①

事隔一个多世纪，似乎人们的观察结论依然是：中国人不会直截了当地讲出真情。

相反，让我们回顾一下西方媒体是如何报道“非典”的：它们的做法是将其夸大。记者们认为，他们有责任报道“真实情况”，并用它来做报刊的大标题。但是，媒体的过分渲染却付出了代价。例如，在法国，对“非典”的恐慌曾导致开始排斥中国人居住的社区，怀疑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传播疾病。以往与世无争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是亚洲人或者是因为咳嗽就会遭到歇斯底里的反应。有过一些祖父母拒绝去看望他们的孙儿女，原因是他们来自亚洲。而法国的报纸刊登此类文章时根本没有片刻的犹豫，他们坚信他们是以“真理”的名义在讲话，而“真理”是无价的。

但有必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吗？这是弗朗索瓦在探究真理的必要性的来源时提出的一个无视传统观念的问题^②。研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们把历史的这一刻确定在西方出现摆脱神话传

① 引自于连：《迂回与进入》第一章。

② 参见于连：《圣人无意》第一部，第八章。

说的理性时期,因为神话传说是具有两重性的,既“真”又“假”。由于这种模糊性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哲学便诞生了,并且要来澄清混淆在一起的真与假。亚里士多德奠定了逻各斯(logos)的根基,逻各斯向人类揭示了一个稳定的、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欧洲的理性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繁荣起来的。这段历史显得非常必要,因为这是理性的发轫。而中国的历史恰恰与之不同。

中国没有史诗,也没有足以说明中国文明起源的真正的神话传说。中国的传说没有形成系统,只在一些书籍里零零散散地出现过……由于中国的思想不是在神话中形成的,所以后来它也用不着通过哲学来形成(以逻各斯的模式来形成)^①……

换言之,在中国,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并不来自摆脱神话的需要,应当得出结论说真理没有任何重要性吗?让我们以一个著名的历史案例为例:在一个类似德雷福斯案^②的案例中,中国人会不

① 引自于连:《圣人无意》第一部,第八章。

② L'Affaire Dreyfus, 19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对犹太籍军官A.德雷福斯的诬告案。德雷福斯出生于阿尔萨斯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炮兵学校与陆军学校,在总参谋部任上尉军官。1894年9月,情报处副处长亨利诬陷德雷福斯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机密,以间谍罪加以逮捕。1894年12月22日军事法庭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判处他在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终身监禁。1896年3月,新任情报处长皮卡尔在调查中发现,真正的罪犯是亨利的朋友F.W.埃斯特哈齐,要求军事法庭重审。亨利伪造证件,反诬皮卡尔失职,后者被调往突尼斯。1898年1月,经军事法庭秘密审讯,埃斯特哈齐被宣告无罪,激起了社会公愤。1月14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广泛开展,法国社会分裂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两个阵营。民族主义右翼分子妄图借此推翻共和政府。斗争极为激烈,并同反犹太主义、反教权主义和反共和主义等活动联系在一起。不久,亨利伪造证件的事实暴露,被捕供认后自杀。埃斯特哈齐也畏罪潜逃伦敦。在民众强大压力下,1899年8—9月,经军事法庭重审,德雷福斯仍被判有罪,但改判10年徒刑。9月19日,(转下页)

愿真实接受无辜者被判有罪的结果吗？

中国的文学对此给出了一个答案的思路，中国有个著名的戏剧名为《赵氏孤儿》，伏尔泰曾受此剧启发创作了《中国孤儿》。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权臣屠岸贾设计陷害并除掉对手赵盾，将赵盾一家满门抄斩，赵家唯一的幸存者——刚刚出生的孩子被赵家的两位忠实朋友收养。屠岸贾不停地寻找并追杀赵氏孤儿。为了让屠岸贾断去追杀的念头，赵家其中的一位朋友佯装出卖赵家，向屠岸贾告发，让另一位朋友程婴用自己的亲生儿子替代赵氏孤儿让屠岸贾杀死。为更进一步保护赵氏孤儿，假装的告密者将真正的赵氏孤儿送给屠岸贾当养子。20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将秘密告诉了他，最后赵氏孤儿复仇，屠岸贾伏诛。无论是德雷福斯案还是赵氏孤儿案，人们都不能容忍判决无辜者有罪或者让罪犯逍遥法外所构成的不公，无论有多大的困难，真理最终会被承认。中国另一部古代名剧名为《窦娥冤》，讲述一名少妇为了使无辜的婆婆免遭判罪而含冤招认，无辜顶罪，经过一番毫无公正可言的审判，窦娥被判处死刑。行刑的当日正值六月，而天空竟然下起大雪。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法官无视真情，导致理性的均衡被打破。

举一个历史实例：日本人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战争罪之一发生在南京，为了恐吓中国民众并迫使他们投降，日本军队将南京城相当一部分市民屠杀了。战争已结束半个多世纪，但历史的这一页却没有翻过去，因为日本人一直没有完全向中国人谢罪。更糟糕的是，在日本出版的一些历史书连他们国家的对外侵略行为都

（接上页） 总统决定赦免德雷福斯，以息民愤。直到1906年7月最高法院才撤销原判，为其昭雪。德雷福斯恢复名誉，被晋升为少校——译者注。

不承认。2005 年春天,在中国发生了反日示威活动,并引起在韩国的连锁反应,说明对于中国人和韩国人来说,尊重历史事实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如果真实不是传说,就应当考虑其他因素。

二

中国人本身如何对待真理这个问题呢?

中国作家林语堂在他 1937 年出版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阐明了孔子在中国古代的一个座右铭之一:中庸。

真理离不开人性,如果被人们误以为的真理与人性相分离,便不是真正的真理。

弗朗索瓦·于连把这句话翻译成:

道与人不远,如果人们误以为的道使他们远离人,那肯定不是道。^①

这里的关键字是著名的“道”,它是中国道家学说中的重要概念之一,道家也因此得名,孔子也提到过这个字。为什么林语堂用“真理”?他是一个接受西方思想的作家,除了中文写得好外,他还

^① 引自于连:《中庸》第十三章。

熟谙语言学和西方思维，所以他用某个字并不是无意识的。他认为，“真理”一词比其他任何词都更深地触及西方人的心灵，他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当孔子谈到“道”这个中国思想最重要价值之一时，必须将其看作是一位西方哲学家在谈论“真理”，这样才能把握他的实质。

但我们现在暂把对翻译的思考放在一边，还是回到林语堂的论述上来。一个问题会立即出现：在西方，哲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如果说真理与人性相分离，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吗？人由血肉组成，人会变化，会变老，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真理也与人一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吗？真理与人性不可分离的概念与柏拉图的，甚至西方普遍接受的“真理”概念（唯一性和绝对性）不就完全相悖了吗？

弗朗索瓦·于连提到了在中国传授信仰的外国传教士，他们竭尽全力为了完成一个：

对他们的中国对话者而言是不可理解的任务。因为对一个中国人来讲，信仰是什么呢？他面对竹林就是道教徒，面对他的君主就是儒教徒，或者当他接受死亡之时，他就是佛教徒。^①

这里的信仰可以理解为“真理”。

漫步中国的古典园林，有时会看到中央耸立有一座亭阁的小湖。人们经常会惊奇地发现，尽管没有任何建筑学上的规则，但

^① 引自于连及狄艾里·马尔塞斯：《从外部反思欧洲（经由中国）》。

湖边通向亭阁的小桥都不是直的,而是弯弯曲曲的。参观者都会问及个中原因并且都会得到如下的答复:“中国的迷信说,鬼只会沿着直线走,弯弯曲曲的桥可以保护亭阁。”大多数时候,参观者都对这种出乎他们意料的风趣的回答一笑了之,因为中国人素以迷信闻名。一次,我向一位中国建筑师提出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中国的园林是世界的缩影,必须从中看到它的多样性,如果小桥是直的,它只能提供一种观点,而弯曲的桥可以让我们得到许多观点。”

听到这位建筑师介绍时,令我吃惊的是他不否认关于鬼的最流行的解说,谈到他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时,建筑师都非常谦虚,从来不强调真理在他一边。而且,完全有可能某些花园的主人把小桥建成曲折形状确实就是为了避鬼,那么真理何在?

可以从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对真理的不同观念,他们是如何通过巧妙的迂回来触及“真品”这个问题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生了一件震动很大的事件,法国一家大商场从中国获得在法国展出秦始皇墓中出土的兵马俑的特许。这项活动引起很大反响,该商场获得很大成功,而且伦敦也要求展出,连英国女王都准备亲眼目睹这些兵马俑。这时,中国人透露说展出的兵马俑不是真品,是复制的,于是女王取消了参观,人们责备中国人一开始没有说实话,使得他们去看的只是些赝品。但是,在那个时期,中国人并不觉得在搞鬼,因为对他们来说,展品真实的重要性和西方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北京的故宫提出了一个明显的真品问题。故宫始建于 1421 年,和绝大多数的中国建筑一样,它使用最多的建筑材料是木材。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建筑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兴衰,其中大部分曾被摧毁后又重建,有的甚至数次重建。然而,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将故宫说成是建于明朝时期,而且没有任何人认为他们这样说不。事实上,即使所有建筑都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重建过,而且即使重建的建筑会与原物都不相同,中国人仍然可以说,故宫的魂还在,而且实际上正是这点对于中国人至关重要。研究中国的建筑时,我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会发现中国的房屋和宫殿从来不选用石头或大理石这些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材料建造,而是使用易腐烂的材料。重建被烧毁或被损毁的建筑,也是中国人使建筑代代相传的一种方式。

再举一例——坐落在北京的著名的恭王府。这座王府中的“三绝”之一是上面刻着“福”字的一块石碑。该字的意义在于其出其笔墨留下很少的康熙皇帝的御笔,传说康熙皇帝是专门为皇太后祝寿而亲笔书此“福”字。但是,“福”字碑显然不是康熙本人刻制的,皇帝用毛笔写下“福”字然后别人把这个“福”字刻在深藏在一座假山之中的一块石碑上。西方人的做法则不同,他们或是把某位名人的思想刻在石头上(如用瓦雷里^①的著名诗句来点缀巴黎特罗代罗宫的三角楣),或是把电影明星的手印留在石膏上(如留在美国洛杉矶著名的中国戏剧院中)。用这两种方式,可以确保其真实性,然而这种把皇帝的御笔保存在石头上的方式(中国人视其具有真实性)明显说明,中国人在真实性方面可以达到西方人意想不到的高度。

^① Paul Valéry(1871—1945),保尔·瓦雷里,法国后期象征派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诗耽于哲理,倾向于内心真实,追求形式的完美。

三

如果中国人无视真理的“绝对性”，他们会对“没有真理就没有正义”这一观点非常敏感吗？

让我们通过一位中国著名的电影艺术家的眼睛来探究这个问题。1992年，中国电影导演张艺谋因其导演的《秋菊打官司》一片而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秋菊是一位农村妇女，生活在四川省一个偏远的山村。一天，她丈夫的生殖部位被村长踢了一脚，秋菊的控告遭遇到当局的不作为，不愿意认定村长有错。于是，她挺着大肚子去乡政府告状，经过乡政府李公安的调解，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几百元经济损失。但当秋菊来拿钱时，村长把钱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没有捡钱，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一级告不下就向更高一级告状，直到最后当局都不耐烦此案了，但又无法作出判决，因为案情太轻微而无法受理，便找出一个理由来拘捕村长。然而，在此期间，由于劳累过度，秋菊早产，最终是村长组织村民全力救助使母子得救，正在此时，警察来了，铐走了村长，让秋菊深感懊丧。

现在让我们看看西方人对该电影的评论。西方人在电影中看到的，只是一场奋战——一位农村妇女为真理而战，冲破了以牺牲草民利益来维护强者的官僚机制的障碍。他们对电影的诠释并没有错，但他们却忽略了电影的其他方面，如影片结尾秋菊为村长被判有罪而万分懊悔。西方人也忽略了很重要的事实：为什么村长会踢秋菊的丈夫？事实上，事件的起因是村长与秋菊的丈夫就批